

司馬遷教育思想述略

著 枝 生 楊

史記卷六

漢 太 史 令 司馬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駰 集 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馬貞 索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義

秦始皇本紀第六

秦始皇帝者秦莊襄王子也。莊襄王者孝文王之中子也。莊襄王名子異，後為華陽夫人嗣。夫人

名子楚也。莊襄王為秦質子於趙。及貴臣為質，致困，留侯待弱之來相事，故遣子

異。臣交質王子孫為質於鄭。鄭公子忽為質於周，是也。見呂不韋姬悅。

之。按不韋傳云：不韋賜酈大員也。其說生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四

生於邯鄲，及生名為政，姓趙氏。正音：政，一作正。宋云：以正月

與趙同祖，以趙城為榮，故姓趙氏。正音：政，一作正。宋云：以正月

正也。始皇以正月旦生於趙，因為政，後以始皇諱，故

死政，代立為秦王。當是之時，秦地已并巴蜀漢中，越

郡以東，有河東、太原、上黨郡，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川

司馬遷与华夏文化丛书



司马迁与华夏文化丛书

杨生枝 著

司马迁教育思想述略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陕)新登字 004 号

司马迁与华夏文化丛书

司马迁教育思想述略

杨生枝 著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市长安路南段 376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6.5 印张 5 插页 140 千字

1995 年 8 月第 1 版 199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ISBN 7—5419—6209—0/G·5457

(简精装) 定价: 8.20 元

序 言

董继昌

中国有世界文化名人司马迁，这是中华民族的骄傲；陕西乃司马迁的故里，这更是陕西人民的光荣。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三秦研究司马迁的学者们组织起来，成立了“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开展有计划的群体性研究，这在司马迁研究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先例。研究会成立后，研究工作迅速铺开，仅两年多的时间，大型工程《史记研究集成》已正式动工，大型电视专题片《司马迁万里行》已开机拍摄，大型丛书《司马迁与华夏文化丛书》第一集已顺利完成，这亦是史无前例的壮举。对这些可喜的事功，我感到十分欣慰和由衷的高兴！这里仅就即将付梓的《司马迁与华夏文化丛书》说几句话。

《司马迁与华夏文化丛书》共28本，包罗天、地、人、物系统知识，从《史记》百科全书这一广阔的领域内揭示出司马迁与中华文化的密切关系。过去，人们通常赞美司马迁是位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或再以“史圣”誉之，这都不足以全面体现司马迁在中国文化史上真正的崇高地位。司马迁对中国文化的巨大影响，郭沫若先生曾以“功业追尼父”称颂，认为是孔子之后的另一位文化巨匠。这是一点不假的。事实上，司马迁本来就是以继承孔子而自诩的。他在《太史公自序》中写道：

“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正是为了不辱父命，继承孔子伟业，司马迁便坚定地肩负起效法孔子著《春秋》而写《史记》的崇高使命。对于《春秋》，司马迁不单单看作是一部“史”书，而视之为“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文成数万，其指万千”，旨意高远、内容丰富的纲领性的文化经典。他的《太史公书》亦绝非一般“记言”“记行”的史官之举措，而是在“紬史记石室金匱之书”的基础上，要写成“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巨著。而这“一家之言”，不仅“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补六艺之不足，还要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其内容的丰富和宏伟，较之《春秋》，意欲要突破和超越是非常明显的。

司马迁以孔子之后的文化领袖自许，决心写出胜过《春秋》的《史记》，并未狂言欺世。论《史记》的成就，不管从中国历史长期已行的实践性，或从集文化之大成的广博性和从领风气之先的进步性哪一个方面而言，较其前人，都是后来居上之佼佼者。如以实践而论，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行之有效的外儒内法的政体，并非是孔子思想的体现，实则以司马迁崇儒而不弃法的思想所构建；上层文化领域内百家竞流的实际，也非孔子一家的独行，而是司马迁“整齐百家”的再现。论其文化知识面的广博，李长之先生誉司马迁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其巨著《史记》当然也就是“百科全书”类的宝藏了。《史记》除了囊括孔子所致力于诗、书、礼、乐之外，又融汇百家学说于一炉，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民族、民俗、特别还有天文、地理、医学、科技等；而且并非停留于孔子“述而不

作”的整理介绍阶段，力求做到“通古今之变”的论述，让人们“原始察终”充分认识其历史源流的发展变化。论其文化思想的进步性，且不必详列对各科文化的卓识远见，仅就政治上不提倡“克己复礼”，而在总结“承敝通变”的基础上大力颂扬革新进步；经济上不重本抑末，而提倡创造财富发展商品经济；在国家的统一上，不囿于“华夷之分”的狭隘圈子，而提倡华夏各民族都是黄帝子孙的诸民族大一统的崇高思想；对外不是闭关自守，自我独尊，而是竭力介绍域外物产，让人放眼更广阔的天地。诸如这些思想认识，不仅在两千多年以前是十分杰出的、领先的，即如在两千年以后的今天，亦是闪闪发光，仍具有相当生命力的。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司马迁是位当之无愧的华夏文化巨人，其文化思想精髓，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真正代表。

令人欣慰的是，丛书的组织和编著者，充分认识到司马迁对中国文化的巨大影响及其崇高地位，不再囿于史学、文学范围的研究，推而广之，努力开拓新的领域，着眼于多层面全方位的探讨。如此全方位深化司马迁的研究，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尤其富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充分探讨《史记》的丰富意蕴，总结两千多年的人事盛衰、存亡、成败、得失的宝贵经验，对我们今天的现代化建设具有积极借鉴作用；科学评论司马迁的崇高精神及对文化的巨大贡献，让人们为有如此震古烁今的文化巨人而自豪，本身就具有产生爱国主义情操的强烈感染力；重视阐明司马迁对华夏文化的丰功伟绩及进步思想，既能使人们正确认识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也非常有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

丛书贯彻“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所收集的各家

的论著，不强求观点的一致，这也体现了司马迁的治学精神。学术研究要发展，不可能没有争议，更何况对司马迁展开全方位的研究，确属开创性的事业，更需要各抒己见，互相争鸣。司马迁竭尽毕生精力所撰写的《史记》，总结了中华二千多年的古代文明，是第一部集华夏文化大成的百科全书，其博大精深的內容，需要集中更多人的智慧，花更多精力来不断研究。因此，我热切希望更多的学者和海内外热爱华夏文化的仁人志士，投身于司马迁的研究，为弘扬华夏文化做出贡献。也希望以此为契机，继续前进，把陕西逐步建设成司马迁研究基地。

1994年国庆前夕于西安

中国哲学史纲要

[14]	 封建教育	
[14]	 封建教育	1
[14]	 封建教育	2
[14]	 封建教育	4
[18]	 封建教育	1
[18]	 封建教育	2
[18]	 封建教育	
[18]	 封建教育	3

目 录

一 儒学独尊时代与司马迁教育

[134]	思想的形成	[1]
[140]	1. “大一统”时代与思想上的	
[140]	“大一统”运动	[1]
[140]	2. “儒学独尊”的文教政策	
[150]	与封建教育体制的建立	[5]
[150]	3. 封建教育的培养与司马迁	
[150]	教育思想的形成	[10]

二 司马迁教育思想与时代精神的

[155]	融合与冲突	[23]
[155]	1. 司马迁教育思想的独特反映	[23]
[155]	2. 司马迁教育思想与时代精神	
[155]	的融汇	[27]
[155]	3. 司马迁教育思想与时代精神	
[155]	的冲突	[33]

三 古代教育的反映与首创中国

教育史传 [41]

1. 记教育活动于叙史之中 [41]
2. 首创中国教育史传 [50]

四 为教育家创立传记 [80]

1. 教育家传记的述史体例 [81]
2. 确立了孔子万世师表的历史地位 [84]
3. 记述了孔子的教育思想 [106]
4. 记载了孔门弟子及其后世儒家的教育大师 [127]

五 司马迁的教育观点及其主要

学说 [140]

1. 独具卓识的教育观点 [140]
2. 兼容并包的教育主张 [150]
3. 富有传统色彩的道德规范 [159]
4. 选贤用能的人才观 [169]
5. 治学精神与学习方法 [172]

结语 [192]

儒学独尊时代与司马迁教育思想的形成

司马迁字子长，西汉左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市南芝川镇）人。他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 145 年），卒于昭帝之初（公元前 86 年左右），享年约 60 岁^①。司马迁的一生恰与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相终始，是在儒学独尊的时代成长起来的。

1. “大一统”时代与思想上的“大一统”运动

封建地主阶级自走上历史舞台以来，随着本阶级力量的不断发展、壮大，为着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从未间断地探索适应自己斗争需要的思想理论，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从秦始皇到汉武帝，封建地主阶级对统治思想的探索经历了约一个世纪之久，法、道、儒

三种主要思潮竞相争占上层建筑中的领导地盘。

秦始皇崇法，在战国末期，把法家的治民政策变本加厉地推行于秦国。法家思想的基本特点，是以严刑酷法治理民众。法家认为，“严家无悍虏，而慈母有败子，吾以此知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也”^②；对人民要“不养恩爱之心，而增威严之势”^③。要使人民心悦诚服地受统治者驱使，就必须用暴力加以强迫。法家的这一思想获得了很大成功，使秦国国力急剧增强并最后兼并六国。统一后的中央集权的大秦帝国，进行了思想“大一统”运动。秦始皇曾经“悉召文学方术之士，欲以兴太平”^④，但并没有改变尊法绌儒路线，“专任狱吏”，“以刑法为威”，用行动的强制来实现思想的统一。结果鼎折复餗，二世而亡。

秦亡汉兴，“海内一统”，刘邦在秦末农民起义及楚汉相争的战争中建立起中央集权制的西汉王朝。当时，刘邦面对六国称王及项羽分封的历史现实，实行了郡县、封国并存的政治体制；而且汉初的王国，从数量看，封地占全国的百分之七十二强，成为全国行政机构的主体。这种政治体制，对稳定汉初政权起了一些作用，但却对中央集权制有着潜在威胁。加之西汉初年，社会经济凋敝，国贫民穷，“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民失作业而大饥馑”^⑤。汉王朝为了赢得人民的支持和重建地主经济，吸收了黄老之术，实行“休养生息”。曹参为齐相，用黄老术，“相齐九年，齐国安乐”；后为汉相国，治事尚“清静”^⑥。汲黯学黄老，治官理民，好清静，为东海太守，“卧闺阁内不出”而“东海大治”^⑦。可见，这种“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在稳定西汉政局，恢复经济发展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到汉武帝时，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在

政治上，西汉朝廷中央集权的力量得到加强。汉初实行的分封制，随着时间的推移，诸王国成了强大的地方割据势力，发生了“吴楚七国之乱”。经过景帝、武帝一系列打击之后，王国的问题才彻底解决。从此，分封制名存实亡，中央集权制得以巩固。在经济上，经过高、惠、文、景四代人的经营，经济空前繁荣，国力日益充实，正如司马迁所说：

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康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摈而不得聚会。^⑧

经过六、七十年休养生息，西汉社会经济繁荣了。“海内艾安，府库充实”，地方官府的仓里装满了粮食，库里装满了铜钱。朝廷所藏的钱，积累到好几百万万，钱串子烂了，散钱无法计算。朝廷所藏的粮食，新旧堆积，有的已经腐烂。民间富人家养马，街巷阡陌马已成群，骑母马出门自觉惭愧，不能与人聚会。当时，西汉的手工业和商业也得到高度发展，“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⑨。

社会经济的发展，必然促进上层建筑的变革。汉武帝凭藉前期所积累的巨大财富，变“与民休息”为“用尽民力”，对外用兵，扩张领土；对内兴作，多所创见。用劳动人民付出的“海内虚耗，人口减半”的代价，来强化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但也造成了封建统治的潜在危机。为了消除这一潜在危机，建立适应“大一统”政治统治的上层建筑，汉武帝大刀阔斧地

进行改革，开展了“独尊儒术”的思想“大一统”运动。

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并不是偶然的社会现象，而是封建地主阶级专制统治发展的必然产物，是西汉王朝在长期的统治实践中摸索出的一种新的思想意识形态。早在汉高祖刘邦即位之初，这位“马上得天下”的开国皇帝，用太牢祭孔子，承认儒学在学术上的正宗地位。但西汉前期，指导政治的学说是黄老刑名之学，其次是阴阳五行之学，儒学博士不为朝廷所重视。著名儒生贾谊杂阴阳五行学，晁错杂刑名学，讲纯儒学的大儒只能做博士官。到了汉文帝时，曾以外藩入承大统，起用新进。改革虽没有成功，但把儒家经典作为官学，却是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创举。汉景帝时期，便出现了“儒老相绌”的局面。汉景帝的母亲窦太后好读老子书，《诗》博士辕固生斥老子书是奴仆书，使窦太后发怒，辕固生差点丧了性命。于是，在窦太后与汉景帝母子之间的夺嗣斗争中，却给儒家经典《公羊春秋》一个显身政治舞台的机会。公羊家的“君子大居正”学说保证了汉武帝刘彻的继嗣权。汉武帝爱好《春秋》及其一生内外事业中无不高举“春秋之义”的大旗，决不是偶然的。窦太后的夺嗣阴谋虽然未能得逞，但“儒老相绌”仍持续未已，而且愈演愈烈。窦太后去世后，儒家学说才在付出了流血代价（赵绾、王臧下狱自杀）之后取得了“独尊”的决定性胜利。

汉武帝一方面强制性地终结了“儒老相绌之局”；一方面采用董仲舒对策，解答了“天命”论、“大一统”等等政治理论上的大是大非。与此同时，在实际政治中，“以《春秋》决狱”，公羊学变成了汉武帝贯彻中央集权政策的法理学；设太学，置博士弟子员，确立了封建王朝的取仕制度，使儒家学说正式成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

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已不同于由孔子在春秋末年创造，经过孟子、荀子等学者在战国时期进一步发展的原始儒学，而是经过董仲舒加工改造的披上神学外衣的儒学。董仲舒用《公羊春秋》的微言大意来改造先秦儒学，并容纳刑名法术、阴阳家思想，以天人关系为中心，建立起一套“外儒内法”、“阳儒阴法”或“纳法入儒”的新的儒学体系。在“儒术”中，汉武帝主要“尊”的是《春秋》公羊学，其次才是《书》、《诗》。其所谓“尊”，不过是“缘饰”或“润饰”。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⑩，正是他独尊儒术的最好注释。汉武帝巡游开边，封禅求仙，滥征频调，倚任酷吏，聚敛财富，都是在专讲名分礼义的儒学旗号下进行的。汉宣帝所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指的就是武帝时期的统治。总结历史经验，特别是亡秦的现实教训，使西汉统治者认识到为了“长治久安”，既需要“吏事”，也需要“儒术”。汉武帝是善于运用“润饰”政治的封建帝王，这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政治上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2. “儒学独尊”的文教政策与

封建教育体制的建立

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采用策问的方法，诏贤良对策。当时出任江都相的董仲舒应征对策，曰：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

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僻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①

董仲舒论“春秋大一统”之义，建议对不是“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丞相卫绾也依此奏行，请罢所举贤良中治申、韩、苏、张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得到了汉武帝的批准^②。从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便逐步在全国大力推行，儒家学派所宣扬的“六艺之科”，即《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典籍便被尊崇为“经”，不仅以经学为教育内容，而且皇帝为倡导研究经学，也往往亲自召集经学讨论会。

“独尊儒术”的基本政策的推广和实施，有力地推动了封建教育体制的建立。但是，这种儒学独尊的封建教育体制，是在以前各个时代教育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非是汉武帝别出心裁的独创。

我们说秦始皇“焚书坑儒”，但却不废儒学，也没有取消教育。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虽然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但并没有完成封建制的建设，在文化教育方面尤其如此。为了加强和巩固地主阶级的专政，以法家思想为指导，实行了“焚书坑儒”，把矛头对准了对秦王朝独裁统治具有威胁性的诸子百家，“非秦纪皆烧之”，而不是只冲着儒学来的。虽然所烧之书有儒家的《诗》、《书》，但不及《礼》、《乐》、《易》、《春秋》，代表不了儒学的全部，这则是李斯继承了荀子“隆礼义而杀《诗》、《书》”的思想。实际上儒家经典并未绝迹，有的还可在社会上公开流行。“坑儒”也并非专坑儒生，只要是“惑乱黔首”的“诸生”，不管是哪家哪派，都是被坑的对象。事

实上秦始皇仍任用儒生，直至秦二世，儒生在朝廷仍可据儒家经典断事，还可进行著述活动。

秦始皇从崇法排儒的基本政策出发，虽没有创建正式的学校，但在教育上却采取了特殊的措施：一是吏师制度。《史记·秦始皇本纪》载：“若有欲学法令，以吏为师。”这就是说，秦朝统治者非常重视法令政策的教育，即“以法为教”；而法令政策的传授，主要是靠各级官吏，即“以吏为师”。二是设置博士官。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及《前汉书·郊祀志》载，秦置博士官，员额数十，其职责为：或议政事，或备咨询，或掌故籍。另外，也可以收徒讲学，传授典章文化。三是乡村普遍设立教化机构。秦王朝虽然“禁私学”，但却“设三老以掌教化”。“三老”是秦王朝中央集权组织机构中最基层的一种乡官，是专门负责掌管教化工作的。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对百姓进行法令政策、伦理道德的教育。秦王朝在各项制度的改革上确实取得了重大成就，但在文化教育方面的改革，却留下了失败的教训。

汉承秦制。西汉王朝既因袭了秦朝的旧制，又接受了其灭亡的教训，有所更易和发展。汉初几十年，灼炙着秦灭堕庙焚宫的烈火，更多地把主要精力集中于恢复凋弊不堪的经济和总结秦灭汉兴的教训上。因而，西汉王朝的新的教育制度的形成和建立，与西汉社会经济的发展相比，就显得发展比较缓慢，而且更滞后一些。

汉武帝实行“独尊儒术”的政策，不仅对汉代教育，而且对整个封建社会的教育，都有极大的推动作用。汉武帝为了推行他的“独尊儒术”的基本政策，采纳了董仲舒、公孙弘的建议，从“治天下以教化为大务”的政治目的出发，实行了新的教育政策：

2.1 兴太学以养士

就是大力兴办学经的学校，选拔经学教师，扩大儒术的影响。正如董仲舒在给汉武帝的对策中所说：“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亡应书者，是王道往往而绝也。臣愿请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⑩意思是说学校是教化之本原，而教化的根本是培养人才，没有有贤德的人才，则“王道”绝也，国家之治就是一句空话。

2.2 重选举以取士

学校培养出来的人才如何使用？主要是靠选举推荐而分别加以录用。一般情况下，汉王朝选拔官吏有两条途径：一是从太学中挑选；二是从地方官吏中晋升。无论哪种途径，均以通晓儒经为标准。正如公孙弘在给汉武帝的建议中指出的那样，“小吏浅闻”，皇帝诏书律令“无以明布谕下”，故主张“以文学掌故为官”。太学生“皆一岁辄课，能通一艺（经）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太常籍奏”；在职地方小官，如能通经学者，则“迁留滞”，擢升其秩^⑪。从这可以看出，汉代“取士”，必须通晓儒家的经典。

汉武帝采取的这一套文教政策，有力地推动了汉代教育的发展，终于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指导，以养士和取士为基本内容的比较完整的封建教育体制。

汉武帝时代的教育体制，基本上是由官学和私学两大系统组成。

官学，有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中央官学指设在都城的官办学校，主要是太学。太学，即中国古代的大学，西周已有太学之名，《大戴记·保傅》：“帝入太学，承师问道。”汉武帝元